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

第一辑

批判诗学的 批判：问题与视界

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现代诗学论集

A Critique of Poetics of Critique: Questions and Horizons
Essays on Frankfurt School and Modern Chinese Poetics

孙士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

第一辑

批判诗学的批判：问题与视界

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现代诗学论集

A Critique of Poetics of Critique: Questions and Horizons
Essays on Frankfurt School and Modern Chinese Poetics

孙士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诗学的批判：问题与视界：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现代诗学论集 / 孙士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0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6987 - 2

I. ①批… II. ①孙… III. ①诗学—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1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历史效果	(1)
一 时间性与异质性	(2)
二 作为事件的效果历史	(5)
三 安德森的“西马”	(9)
四 旧事重提	(14)
五 本书结构	(19)
第一章 尚未抵岸的漂流瓶	(21)
一 反犹主义偏见与人格心理学	(23)
二 在美国问题与德国理论之间	(31)
三 先在的弗洛伊德	(36)
四 批判及其语境:他山之石	(45)
五 漂流瓶的当下性	(55)
第二章 启蒙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59)
一 现代性批判,抑或后现代主义	(60)
二 启蒙现代性问题	(64)
三 否定的艺术	(72)
四 反思现象学批判及其意蕴	(95)
五 理论命题:语境性与本土化	(104)
第三章 现代性的碎片,抑或后现代经验	(113)
一 历史的天使	(114)



二	现代性碎片	(117)
三	经验贫乏时代的经验	(121)
四	恋爱中的本雅明	(125)
 第四章 人文主义,或者科学主义		(140)
一	技术理性批判	(141)
二	文化与审美	(147)
三	结构主义与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166)
四	意识形态批评	(172)
 第五章 三个: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场式		(186)
一	本雅明:借道出场	(186)
二	阿多诺:沉默及其意味	(194)
三	马尔库塞:诗意的建构	(201)
四	在场与出场	(208)
 第六章 媒介化与公共艺术		(212)
一	本雅明工业与媒介再生产	(212)
二	公共艺术与人的生活方式	(216)
三	人的大众文化形象	(226)
 第七章 知识生产与审美批判		(235)
一	美学知识生产	(235)
二	实用主义与本质主义	(247)
三	理论之后	(252)
 第八章 信息时代:身份、经典与文化社会学		(258)
一	信息时代的身份认同	(259)
二	及物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	(268)
三	经典化问题	(282)

第九章 批判诗学的理论遗产	(299)
一 批判理论的非社会化?	(300)
二 非社会化批判与文化工业逻辑	(307)
三 文化工业理论再反思	(315)
后记	(326)



导论 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 在中国的历史效果

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研究语境中，纳入对于文学理论当下建构的反思性视野之中，诚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此之前，如何在本土视野中辩证地而非僵化地、复杂地而非简单地、历史地而非静止地认识和阐释被纳入所谓对象及其“异质性”，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课题。否则，思维方式的僵化将指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质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性”，简单化将流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伪同一性的障目一叶，静止化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选择性失明，由此带来理论上的削足适履与批评上的话语暴力的危险自不待言。

如果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性、历史性思考和阐释视为一种“异质性”，那么恰恰是“异质性”构成其理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性根基，构成其在中国语境中阐释并且与中国语境具有相似结构因素和动力条件的基础；彻底地、有效地将“异质性”分离出去，视之为更有效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前提，或者赋之以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效果和理论普适性的使命，既背离了反思对象本身，也远离了理论反思本身，与曾经的“西马非马”之类的命题可谓异曲同工。就此而言，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 时间性与异质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历史效果构成了其于 20 世纪深远影响的重要根源，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效果，所指向的是其理论有效性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思潮本身的自我回顾，也可以视为对于其理论历史效果的批判性审视，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即为其中之一。哈贝马斯早在 1984 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研讨会上就对“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指称的虚假同一性提出批评，认为除了短暂的美国流亡期之外，它并不指向一个抽象的同一的所指，拒绝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伪同一性并非否定其理论上的亲和性，而是要对学派的深度复杂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对此国内学者也有清晰的思考。比如曹卫东指出：“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道尔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① 将法兰克福学派狭隘化地等同于文化研究，进一步等同于大众文化批判，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本土文化批判而仓促找到的一个中国化了的理论武器，换言之，大众文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仅仅



是特定时代本土接受中的一个现实镜像，从中显现的与其说是法兰克福学派，毋宁说是接受实践本身。

应该说，哈贝马斯与曹卫东的反思无论对于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研究还是理论家个案研究中来说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启示性，学界对此已有所警醒，但未达成共识。比如大众文化批判这一术语就不再简单套用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①，而关于卢卡奇的认识却还停留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套子中，仿佛卢卡奇既不存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之分，也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与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青年卢卡奇之分，不存在意识形态强制语境的策略性话语与自我批评的真实性话语之分。一个抹去历史性和内在差异性的卢卡奇，其人被阐释为同一性对象，其书被阐释为一系列同质性文本，其思面临着“改写马克思文本”、“泛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等简单化指控。揭开伪同一性的表象，露出的将是“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屹立着一位总是正确的马克思”^② 这一传统教科书僵化思维模式的不散阴魂，时不时游荡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话语的研究与评价中。不仅对于卢卡奇，而且对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永远正确的马克思永远站在永远片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所谓永远正确的马克思却难以跳出那种僵化机械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的马克思。

如果说可以姑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内在差异性、多元性远大于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整体；如果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其内在的亲合性，那么与其大而化之地概括为同一的“非马克思主义”“异质性”，倒不如更准确地指认其重新阐释马克思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 具体分析可参看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一章第二、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2页。

② 张一兵：《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逻辑架构；进一步说，这一逻辑架构建基于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阐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观察模式的双重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起点和现实意向之中。笼统批评将卢卡奇与阿多诺共同背离了马克思实践主体论，实为无视具体性和历史性而追求伪同一性的具体表现。事实上，阿多诺怀疑理性、抛弃主体之说早在哈贝马斯那里就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否定辩证法对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并非以对于主体范畴的抛弃为前提，而是通过建立主客体之间平等的星丛式关系以打破理性同一性的辖制，“它是对主体还原的纠正，而非对主体维度的否定”^①，由此阿多诺批评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客体维度的遗忘，其实质是以客体维度以及主客体的平等批判经由《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意识走向历史辩证法主体维度以及主体之间的平等，而对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来说，将马克思黑格尔化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康德式的韦伯。但无论如何，一个强调星丛式主客体关系，一个强调作为主客体统一体的无产阶级主体，那么批评他们的理论话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范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某种预设的批评立场之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否则，又怎么可能对于青年卢卡奇明确批判的“类似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②视而不见？

脱离了“正确的时间性”^③的客观性只能是客观化了的主体性，同样，无视历史性的“异质性”也不得不成为理论暴力下的虚假普遍性。与哈贝马斯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不同，霍耐特对于学派历史效果的反思着眼于跨文化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话语，其思考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仅以欧洲思想家为理论依托，且将欧洲视为世界的全部，因

① Adorno, "Subject and Object", Andrew and Eike Gebhardt, ed.,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Books, 2005, p. 502.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智章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

③ [匈]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杜智章编，李涪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异质性存在，由此霍耐特进一步质疑批判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接受的有效性^①。

虽然霍耐特的质疑依然难逃某种中心主义的阴影，但相隔二十余年的历史效果反思强调理论内部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强调理论本身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对于批判理论自身的文化异质性的反思清醒而理性。霍耐特反思的意义并不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适性如何获致，而在于它既事实性地明确自己理论的现实土壤和现实所指，又价值论地看到理论内在的致思路径和逻辑行程。异质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异质性，抽象的异质性只不过是某种永远正确的观念和尺度的牺牲品，而将“异质性”事实判断直接等价于价值判断更不是对于事实本身的澄清，而毋宁说是在某种隐蔽的价值论基座之上给事实判断摆出非事实性的姿态而已。强调这一点，只是为了提醒对于诸如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的异质性等同于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警惕，而这一逻辑就曾以“西马非马”的命题较早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中。

二 作为事件的效果历史

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影响巨大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文学思想流派和思潮在整个 20 世纪乃至今天享有巨大的声誉，其诗学话语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其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派和思潮绵延至今，正是源于其巨大的历史效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于中国同样如此。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诗学的接受和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5 年—50 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接受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包括《左

^① [德] 狄安涅：《“批判的向度：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2009 年第 2 期。



拉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本质》、《论现实主义》、《叙述和描写》等，在胡风关于文艺主客观关系的论述中也包含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随着胡风被批判，卢卡奇也被批判为“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①，萨特、布洛赫、梅洛-庞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被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面教材进行翻译和内部发行，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完全搁浅。其中，对于作为反面教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②，为新时期的接受和研究播下了种子。

第三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哲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日趋活跃，10年间发表研究论文250多篇，出版著、译作40余部，相比之下，学界对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就集中体现的美学、文论的研究则显得较为沉寂，尽管有学者在人道主义、人性以及现代主义文艺讨论中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影响，个别著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部分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思想，但整体看系统的研究并没有展开。造成这种沉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处于批判和反思中的新时期文艺学忙于将文学拖回自身并重新清理文艺研究的基地以及进行文艺研究方法和文艺观念变革而无暇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纳入研究视野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阶段（90年代—20世纪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活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翻译提供了动力，而走出批判反思期的新时期文艺学开始其自身的创新和建设的路向也使借鉴、吸收西方理论资源成为必然，这一切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沉寂局面被彻底打破，并逐步成长为理论热点。1988年底四川成都首次西方

①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② 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读书》1998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讨会的召开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开始系统展开的标志,早期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出版。这一阶段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传统观念出发,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定性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美学思潮,批判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挑战和歪曲,在对其总体否定的前提下,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合理之处。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著以及西方当代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著作的译介和阅读,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向:研究范围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扩展并集中到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译介和述评转向深度阐释和批判地吸收,研究内容上则质疑和批判早期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简单定性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文艺思想的个案研究全面深入进行,研究路向上初步与中国现实语境结合而显露出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否定的美学》以及关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理论家个案研究等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出版。

整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诗学的接受和研究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系统化的风雨历程,这一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社会状况的深刻变迁和美学、文论发展实践的历史轨迹。当然,我国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美学、文艺传统也规范了切入对象的视域选择,从而使敞开的论域具有了本土化的色彩,择其要者有三:接受背景、动力因素、结构因素^①。

从接受背景看,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首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的一部分而接受的,其发育成长也主要是在译介、阐发和论战中进行,而接受主体虽然受到古典

^① 冯宪光:《“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文论传统的熏陶，但他们主观上却保持与传统文论某种程度的“断裂”，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尽管无法完全脱离一定的文艺现实和传统，但其本身并非文艺创作实践的理论升华，而更像是一种横向移植，在某种程度上，现实背景的浓重和理论背景的单薄为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急进功利和庸俗化播下了不祥的种子。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规模接受和研究则直接面临着推动新时期美学、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背景，而其理论背景则更为深厚、扎实。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的主导性地位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获得接受的优先权，而新时期文艺学的批判与反思以及人学基础的确立、文艺自身的回归则为非本土文化的接受清理出了必需的基地，文艺研究方法和文艺观念的拓展和革新又准备了更为理想的接受和研究主体，这一切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和研究做好了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因而也使接受更具理性。

从接受路径看，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更为直接。我国最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主要转译自日本，到 50 年代苏联文艺理论才占据我们的接受视野并在后来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文论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①，而等到后来重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时，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早已定型，因此总体看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具有间接性。相比之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和深化，可以接触和能够阅读西马原著的接受和研究主体群迅速成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原著的译介更为直接和便捷，比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多译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这种接受的直接性使研究直面对象本身，从而抹去了对话与交流的诸多遮蔽，当然这也顺手为研究的浮泛倾向打开了边门。

从接受的动机和效果来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功利性他律向理论性自律转变的过程并在这一转

^① 代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文学评论》1997 年第 4 期。



变之前就确立了自身的权威地位的话，那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则更像是萨义德所言的“理论旅行”的一个标本：如果说前者的中国接受首先源于民族革命的需要，则后者则首先出于新时期人道主义大讨论的现实和学术的双重背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参照，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则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导，从而使理论表现出更大的选择性和变异性，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出发点的对于文艺和审美的革命意义及其功能的强调被淡化了，而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将这种反思与人的解放的关联却在接受中变异为将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联，针对启蒙工具理性的异化批判转变为对于官僚异化的批判，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于现代性反思这一极其重要的维度。

三 安德森的“西马”

从1935年《左拉与现实主义》一文的发表到5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这首先根源于其现实主义指向契合了革命实践和政治实践对于文艺的现实需要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艺发展方向，然而随着胡风被批判，卢卡奇也就沦为“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①，萨特、布洛赫、梅洛-庞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被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面教材。新时期伊始，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日趋活跃，而美学、文论的研究则相对沉寂，至8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活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翻译提供了动力，而走出批判反思期的新时期文艺学开始其自身的创新和建设的路向也使借鉴、吸收西方理论资源成为必然，这一切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沉寂局面被彻底打破，而正是在这一时

^①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期，出现了哲学上的“西马非马”的命题与论争，在诗学研究领域则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某一观念出发，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歪曲，主张在“西马非马”的前提下展开研究。

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实质上与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认识密切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美学上作出系统、全面的论述，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贡献恰恰主要体现在美学、文论中，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来认识和评价自许“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否定性倾向的因子。部分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抛弃了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文论观同西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文艺观混为一体，因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发展。然而，仅仅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或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相区别的狭隘视域，势必一方面将二者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其混同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或夸大其马克思主义的向度；同样地，单单局限于它们之间联系、继承的视域而无视区别、发展，则有可能导致遮蔽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补充”和“发展”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结果都是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湮没不彰了。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判断的观点，早在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而且这一观点的被接受也与安德森关系很深。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在理论上转向脱离实际的诗学领域：“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叛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



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①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安德森这里就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丧失信心的失败的产物，但是这一观点，即便在欧美学者那里也受到质疑，比如波林·琼斯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特点和工人阶级状况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向意识和诗学迁移的现实性，因而指责他们放弃政治斗争、脱离工人阶级运动实属文化偏见，并不公正。

事实上，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立足于建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之中，并且由此决定了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基本判断。在他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微不足道，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发展却令人兴奋^②。显然，安德森对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立足于他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现实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当然，讨论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本大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涉及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涉及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英国新左派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就是“它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③，但这里无意对此论题展开讨论，而只消指出，在围绕以《新左派评论》为中心而展开的关于新左派路线的分歧中，安德森的基本认识是，对于第二代新左派，或者说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进行理论的建构工作，而不是将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而去干涉当下英国政治生活。问题在于，安德森作出这一判断的基础何在呢？

①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② [英] 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③ [美]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